

海外著名人类学家讲座译丛

潘 蛟 主编

全球现代性之窗： 社会科学文集

[美] 阿里夫·德里克 著

连 煦 张文博 杨德爱 等 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3950964

C52
259

海外著名人类学家讲座译丛

主 编 潘 蛟

全球现代性之窗：社会科学文集

**Windows on Global Modernity:
Writings on Social Science**

【美】阿里夫·德里克 著

连煦 张文博 杨德爱 等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北航

C1660432

C52
259

· 3000000000 ·

内容提要

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教授作为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和左派学者,对全球化和全球现代性等问题持有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他在本书中指出,近30年来被新自由主义所驱动的全球化的重新配置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同时,管理、通信、生产和消费等新技术也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成为可能。在这种形势下,全球化非但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各种差异,反而带来了新的差异,加深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他非常清醒地提出,全球化与以欧美为核心的殖民现代性仍然纠缠在一起,包含着诸多国家和社会的冲突,全球化本身的局限性使它不可能消除经济、社会及族群的不平等,“更大的全球化将会解决全球化问题”只是一纸空谈。在德里克教授看来,当下的全球现代性是一种混乱的现代性,而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现代性。人们常以个人、族群或民族的经济成功来衡量现代性和文化价值,这是不对的。消费文化正在破坏和耗尽原有的传统文化。对于发展的追求加速了财富的集中和地方之间的不平等,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是相当程度的边缘化。于是,对全球化的抵制开始呈现出强劲的气势……我们时代的社会和文化正在被重新配置,它们的发展和走向值得人们密切关注。

责任编辑:石红华

责任出版:刘译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现代性之窗:社会科学文集/(美)德里克著;
连煦等译.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130-1882-1

I. ①全… II. ①德…②连 III. ①全球化—文集
IV. ①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7313号

全球现代性之窗:社会科学文集

QUANQIU XIANDAIXING ZHICHUANG; SHEHUI KEXUE WENJI

【美】阿里夫·德里克 著 连煦 张文博 杨德爱 等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30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字 数:305千字

ISBN 978-7-5130-1882-1/D·1690 (4726)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507/82000893

责编邮箱:shihonghua@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21.25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	---

一、全球化之后的现代性

全球现代性?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	19
殖民主义的再思考: 全球化、后殖民主义和民族	38
文化反历史? ——东亚的认同政治	61
时间的空间、社会的空间及中国文化问题	83

二、认同的政治: 离散和地方

重新引入历史: 关于各种离散、杂糅、地方和历史	117
亲密的他者: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离散族群	150
重要的不是来自何方而是身在何方: 居所话语对离散话语 的替代	168

历史化后殖民——定位爱德华·萨义德：空间的时间及旅行
理论家 192

三、全球现代性之旅

种族言论、种族和当代种族主义 223
质疑现代性？——全球现代性时代的文化和宗教 249
殖民主义，革命，发展：从历史视角看东亚政治斗争中的
公民身份 272
理论与实践中的跨民族国家主义：采用、误用及滥用 291
全球现代性、殖民主义和地方的建筑 310

导 言

阿里夫·德里克著

连煦译

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对我 2006 年出版的《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 Modernity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一书所提出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这些文章都写于该书出版的前后，它们为“全球现代性”提供了不同的视窗。“全球现代性”其实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用以表现近来世界上所涌现出的全球化图景。当现代性走向全球之际，它已经被碎片化了。现代性的诉求是“选择性的”或“多样性的”，即便它们还没达到相互开战的程度，也是相互竞争的。作为一个概念，“全球现代性”就是试图去领悟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它所展现的是现代性走向全球过程中的演变。

这些文章涉及全球化的若干现象，一些人相当乐观，把它们当做一个新时代来临的征兆，认为它们将迎来世界主义的和平等主义的全球文明。尽管这个文明仍与殖民主义（以欧/美为核心的殖民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却被寄希望于消除现代性当中的经济、社会及族群不平等。相反，有些人认为近来的全球化不仅没能消灭先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差异，而且还唤醒了看似处于休眠状态的差异，创造了自身新的差异，从而深化了跨国性的不平等。我在这里所说的全球化是指近 30 年来被新自由主义所驱动的全球化，它重新配置了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管理、通信、生产和消费的新技术已经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敞开了所有的空间。

对于当下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的重要性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且其重要性也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从政治和文化领域来看，和30年前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那个世界相比，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世界有了一些新的共性。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为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带来了新的支持者，他们已经重新勾画了政治的轮廓。但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一些相同的原因，沿着国家、社会、族群和文化的裂痕，从最贫穷到最富有的国家都存在阶级鸿沟，全球化也在发生断裂。各种差异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社会冲突，而冲突则代表着全球化的局限性。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和社会剧变深刻地表明，全球化正是建立在其诸多矛盾基础之上的。这些矛盾有力地揭示出：世界的改变越大，各种势力对它的控制就越不会放松。于是，全球化的空想家和受益人所作出的承诺和继续作出的承诺就被抛诸脑后。在全球化的招牌下，一味追求发展的拜物教给自然和社会带来很大破坏，“更大的全球化将会解决全球化问题”的承诺却对越积越多的破坏证据视而不见。

在这篇序言中，我想要简略地阐释一下全球现代性的概念，并思考全球现代性在其多种现代性诉求中所面对的文化现实的挑战。同时，序言也会对价值观的分崩离析做出简要评论，它是全球化在文化方面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并使解决全球化矛盾的努力无功而返。如果我们想要走出全球现代性，价值观的恢复就是最基本的第一步。

全球化的当代意识已经让人们认识到，现代性在每一阶段的演变都是以某一阶段的全球化为标志的。19世纪的后半叶似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阶段，而最早伴随现代性出现的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欧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即“欧洲现代性”）正是欧亚互动及非洲和美洲、太平洋地区融合的产物。欧美现代性在每一阶段的演变也带来了扩张的全球性，20世纪末的全球化就是最近一次扩张的表现。它的重要性在于使我们看到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所存在的历史与资本主义现代性自其被如此命名以来的历史一样久远。

最近一个全球化的阶段，是否会像安德烈·根达·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和乔瓦尼·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 出于不同理由所提出的那样——代表着霸权在世界上发生体系性转移 (从美国转向中国和东亚), 还是像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预言的那样——仅是资本主义在最终崩溃之前向其领土边界以外扩展空间的一个高潮, 还有待于更多的观察。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全球化似乎都正在其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中耗尽精力。这些矛盾所质疑的不仅仅是走向全球性之意愿的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 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其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消灭了各种他者, 而他者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自己的定义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也已成为现代性发生冲突的一个场所, 一些曾经对现代性来说已不复存在的障碍又被重新拿出来, 用于证明选择性现代性诉求或多种现代性诉求的合法性。现代性已经不是第一次失去它的方向了, 但这一次的迷失似乎是带着它前所未有的终结感而到来。

19 世纪晚期的全球化在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散中到来, 这使世界处于由欧美定义的现代性霸权之下; 同时, 在追求民族自治的革命中, 政治走向分崩离析, 给全球化带来危害。这一次, 全球化是后殖民性和后民族性的, 折射于全球的司法主权国家当中, 因而被预言将摆脱霸权的现代性。资本掌控下的全球化沿着文明、国家和族群的断层通常伴随有“文化”标签下的碎片化。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当代所代表的并不是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决裂, 而是作为其产物迎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高潮。尽管有着这样的区别, 但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乔瓦尼·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安德烈·根达·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一些学者还是将全球化理解为一种空间的无限扩张, 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内在动力, 这样的观点一直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约翰·霍布森 (John Hobson) 和列宁 (V. I. Lenin), 因为资本主义的语境和产物 (它的“逻辑”, 借用一下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Fredric Jameson) 对后现代性所做的比喻) 已经在纵

向的连接中被全球化了。正是这种现代性“逻辑”的全球化使人们用该词的单数形式来谈论全球现代性。

然而，考虑到抵抗和压制的相互作用标志着现代性的历史，仅将现代性的全球化看做革命扩散的简单过程则具有误导性。把现代性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的语境和产物来谈论已经为这种关系导入了矛盾心态。资本主义产生于有特定历史的社会和文化语境，资本主义和它的语境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的关系。资本主义确实带有它在欧洲特别是西北欧起源时的文化痕迹，尽管自希腊、罗马以来的资本主义就是自主发育的这一欧洲中心主义概念一直受到挑战，但强调把资本主义放到更大的欧亚语境中（换言之，即资本主义的“全球”）以及通过后来兴起的民族—国家所进行的国内外扩张和殖民活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合理性。即便在欧洲内部，就算资本主义改变了当地的社会和文化，它在扩张中也经历了地方对它的改变。资本主义在与当地社会遭遇中所呈现出的不同形式在它扩张到欧洲以外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及文化都更具异质性的地方时更为显著。最终，尽管这些社会坚持它们的地方性，同时也被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改变。

在欧洲资本主义扩张中出现的现代性文化及其北美和太平洋分支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过程。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现代性内部存在差异，却被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当做是欧洲、欧美或美洲的现代性。然而，差异的确存在。前者赋予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以普遍性、关联性和适用性，而后者则坚持将融入本土作为打开现代性大门的条件。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和在资本主义吸纳人口的扩张中都涉及大量暴力。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关于现代性的矛盾心态被更强大的暴力所征服，暴力明确地披上殖民主义伪装，以种族优势或文化优势为正当性，强制打开通向现代性的大门。但是，在欧美地区以外的现代性话语中，对欧美声称的普遍性一直存在显著的矛盾看法，并且大多已经在“西化”和“现代化”之间画出了一条界线。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更多地出现在推进现代性的革命者和保守派当中，而不是自由主义者当中。

多种现代性和选择性现代性的话语是这种矛盾心态的最新表现。由来

已久的矛盾心态在现代性技术与其过时的欧美文化之间做出了区分。现代性技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衰落中得到了认同，而过时的欧美文化则将被替代或涵化。能够区分现在和过去的是一些获得了力量的文化诉求，它们拒绝把同化于欧美文化作为进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条件。在过去 30 年全球关系的重置中，我们一方面见证了资本外围的消失，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新内核的显现，它们对欧美的统治形成了竞争和挑战。在当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中，这就是地缘政治的终极语境。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似乎排除了任何其他系统性的替代选择，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中进行文化改革。

“全球现代性”作为概念正是企图抓住共性中的差异（或者说差异中的共性），异中有同或同中有异的情形引起了矛盾，矛盾不仅推动了国内外的日常政治活动，而且驱使人们去寻找能够驾驭它的概念工具。我使用“全球现代性”这个术语的想法是，在由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形塑的世界中，现代性是很活跃的，它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需求遭遇地方性文化诉求的过程中不断被改造。随之而来的现代性的碎片化或许既可以看做是现代性的终结，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将现代性历史化的时机，即以现代性当下的形态来认识它，并从现在的有利视角去重铸历史。后面一种看法获得了它的正当性，因为这个世界普遍承认，文化差异在当下是可以和平共存的，这种可能性并没有被预先排除。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性仅是多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性在其欧洲起源中得到明确表达，后来在欧美霸权中被全球化，即欧洲现代性，现在则在多种现代性的增强中退却。全球现代性同时成为欧洲现代性的产物和否定力量。

因此，最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性而是欧洲现代性在实现其全球目标的过程中为其自身的被否定奠定了基础，而欧洲现代性是欧美在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对现代性意义的主宰。现代性的辩证逻辑在确认了当下现代性的同时还识别了与其起源的根本性反差，这也折射出知识界在过去 30 年中的思考。从事后来看，后现代性和后殖民性的话语现身于去殖民

化的艰难过程中，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社会主义的“新世界秩序”预言中得到增强，但它们是否真能表述这个辩证转换却是值得怀疑的。对于这个辩证的转换，我们只能满怀期待，尚无法确言其结果。标志着正在发生转换的并非只有后现代性和后殖民性话语。事实上，它们或许可以相当于左派知识分子所用的地缘政治性话语，即“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Samueal Huntington）已使这一话语相当出名，他把辩证转换的结果看做是欧洲现代性和向其发出挑战的已经现代化了的其他文明传统之间的冲突——尽管对他来说这只是防御性的举动，并不值得庆贺。亨廷顿在强调“文明”的时候，将民族归属于过去，这是不对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十年的全球冲突见证了“各种现代性之间冲突”的增强。冲突的增强如果不是受到了亨廷顿思想的鼓舞，也是得益于类似的观念，而美国政府已经决定要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其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是过去 20 年里现代性概念的转向，它和全球关系的改变是紧密相关的。现代性在摆脱了欧美现代性的目的性预期之后，似乎和文化传统保持着一致——如果现代性不是内在于文化传统之内的话——而文化传统早先被看做是现代性的障碍。这或许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术界所发生的“文化转向”的终极意义，而“文化转向”是更为广泛的全球转向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不仅导致了欧美的全球统治，而且也产生了挑战这种统治的新的资本中心或核心。这种挑战中最不可忽视的部分就是文化的挑战。其他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声称，他们不仅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甚至似乎更擅长于资本主义，这样的声音鼓励了资本主义从其欧洲起源中脱离关联，那些社会穿透资本主义的欧美文化光环，把资本主义变成一种管理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只和资本主义自己的文化有关。因此，资本主义能够在各种文化语境中被同化，而且资本主义自身就要求它所处的环境主要是技术性的。中文里的“体”（物质）和“用”（功能）非常简洁地抓住了这种差别：本土文化是物质，资本主义是功能。这种假设是，资本主义服务于本土文化，穿上本土文化的外衣，而不是相反。在追求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时，文化已经成为冲突必不可少的因

素，那些冲突发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结构中及其未来发展中，使阶级、性别和种族这些传统上的重要社会问题黯然失色，在族群、民族和文明对现代性的诉求面前，阶级、性别和种族退却了。

全球现代性的“文化复杂性”为以非霸权方式来思考全球关系打开了缺口，这是受到欢迎的。差异不再被自动地投射到进步的时间序列中，尽管很不情愿，人们还是开始承认所有社会都拥有相同的文化时间性，这可以从所有社会都平等参与全球体系中得到具体证明（不用说，像巴勒斯坦这样的一些社会是例外，它们被强制性地排除在全球体系之外——不是因为它们的“落后性”，而是因为它们的“劣根性”）。随着现代性的转化，文化差异转化为时间差异的问题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想象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承认现代性不再以种族中心主义的欧洲现代性所设定的目的尺度来衡量，而是将现代性放到各种结构关系中，那些结构关系对于不存在霸权意识形态中心的现代性来说，既是它的产物，又是它的组成部分。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多元文化主义如果还不是普遍的愿望或实践的话也已经成为一个公开承认的目标。

现代性所涌现出的文化诉求是否意味着“选择性的”或“多样性的”现代性的出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的庆贺或许为时过早，“文化复杂性”的承诺还远未实现，这一方面主要源于全球现代性的各种矛盾以及欧洲现代性在其结构中的延续，另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不断凸显。全球现代性意味着曾在欧洲现代性制度中盛行的权力关系的重新分配。权力关系的重新分配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了，因为文化差异被赋予了特权，而文化差异又使权力关系神秘化，坐实了政治和文化形态的差异，那些政治和文化形态又正是受到质疑的欧洲现代性的产物，文化差异还在文化背叛或文化霸权中提出了普遍性的愿望，这种愿望或许能够从差异中生产出共性。结果形成价值观的真空，除了发展的各种技术以外，关于现代性的意义永远无法达成共识，现代性只能被认同于某个版本的资本主义，与战争和监控的各种技术相关联。

文化差异的稳定和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成功。欧美权力的衰退或许是可见的，这从相对性上来看是肯定的，从绝对性上来说也许同样如此。但欧美权力仍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虽然有一些口头上的保证，但少有迹象表明它会愿意放弃政治上或文化上的霸权。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和认可的是：殖民问题被暴露于欧洲现代性的核心；各种暴行伴随着欧洲现代性在欧洲的进程；欧洲现代性在其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支持了非人性的暴力。然而，这样的承认和认可对于削减意识形态上的傲慢和剥夺欧美在殖民实践中的特权并没起到多大作用。北美和欧洲继续在文化的生产和引领全球趋势方面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而且，它们也没有失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在贫困和边缘化中寻求生存和改善境遇的芸芸众生。北美和欧洲不再是这些人唯一的目的地，但迄今为止，它们的吸引力还遥遥领先。

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说，挑战霸权和要求承认差异的诉求正是在欧洲现代性的传统中找到了合适的场景。在主张差异的诉求中，文化传统渗透了民族和文明这样的分类，而民族和文明是欧洲现代性的产物。用来支持那些诉求的历史证据衍生于围绕民族和文明来组织过去和现在的一种思想模式。那些诉求对“本土”差异的坚持将注意力转向了融入欧洲现代性之前就已存在的文化禀赋，掩盖了在遭遇欧洲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刻变化，那些变化不仅是历史传统中关键的一部分，而且也改变了后来人们看待本土传统的方式——包括种族、族群、阶级和性别这样的核心问题。

这意味着差异不仅仅是沿着民族和文明的断层而出现的差异，它也包括民族和文明内部的众多差异，它们指向了和现代性的不同关系。除此以外，我们还能怎样解释对于历史的评价为什么会在过去 30 年中经历了如此之大的变化？过去 30 年里，世界上的很多社会用激进的现代性来否定历史，但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让位于重新承认历史，它通过对现代性的批评得以实现，而不再提倡革命的现代性。历史与当下关联的冲突持续存在，它们在全球的文化和政治中、在各个民族内部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在现代性的话语中，民族和文明的文化仍占有中心位置，将其他重要的差

异丢在阴影当中。对民族和文明的坐实，其问题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民族对文化的挪用。正如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所说，民族主义是东方主义的继承人。我们现在所见证的或许就是东方主义在全球现代性动力中的复活，或者更好一些来看，是民族主义的自我东方化正走入视野，尽管有针对民族主义自我东方化的批评，它却一直存续下来了。

但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却是欧洲现代性存续下来的最重要保证，不管这种欧洲现代性是否以欧美作为它的霸权核心。尽管有必要避免将所有文化语境都并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这样的还原论，仍然可以讨论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欧美的驯化过程中已经使欧洲现代性的组织形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或是负担），包括那些要挑战欧美霸权的人们。确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欧美所要求的这些组织形式和实践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财产，从而进一步固化了他们的霸权。现在，公司经济的各种需求是所有民族的驱动力，尽管国家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语境也有所不同。同样地，消费实践也是这种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文化实践的变革直接施加压力。忽视人类或生态后果的发展是一种“全球信仰”。新文化主义中任何能够被感知的民族文化价值都取决于经济现代性的成功，这是“二战”以来一直指导着现代化话语的设想的延伸。这些设想已经获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其他政治和社会标准已经被当做文化霸权被推到一边，对普遍主义的否定把现代性置于一种不稳定的共同价值观之中。过去的传统被吹捧为民族差异或文明差异的象征，因此也是现代性的象征，为了能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更加匹配，过去的传统正处于被重新解释的过程中。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它对其革命的历史和帝国的历史都始终存有矛盾的心态。过去30年中经济变革的假定目标一直都是“让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将资本主义的“用”拿来为社会主义的“体”服务。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被重新解释，令其与“全球化”保持一致、与成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保持一致。类似地，据说代表着中国文化精髓（或说代表了“东亚”文化精髓）的孔子和儒教将把现代性

和资本主义移植到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对它们进行改造，就像过去改造外来入侵的文化一样。全球资本主义的成功已经为中国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关注。这种关注重现了对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久已存在的东方主义想象，但它也从中国的经济成功和近来取得的政治权力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尽管中国人对过去怀有明显的不安，领导人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真的要把孔子从博物馆里搬出来，可以说，他们对是否要在其海外宣传机构中把孔子作为中国的象征也不是十分确定。孔子学院是党或国家宣传机构的延伸，除去它们的政治价值以外，同样也是经济交流的渠道。资本主义文化处于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过程中，就连精英都想移民到那些更为先进和开放的欧洲及北美资本主义社会。

普遍价值观之可能性的信念瓦解是全球现代性中值得关注的最后一个方面。普遍主义因为和殖民现代性的共谋而遭到攻击，也就是说，普及欧美价值观的诉求为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统治世界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但同样重要的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其他价值观已经能够被投射到世界上。中国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当然绝不是唯一的例子。多数时候，重申本土价值观并不那么野心勃勃，它只是以文化自治为目标，而不是要把民族的“软实力”投射到世界上去，这一直是中国文化政治自己承认的目标。

无论哪一种情况，对于霸权社会中的普遍性诉求，全球已经增强了自我意识。因为对这些诉求的怀疑已经成为挑战欧洲现代性的一个突出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的全球化及其价值观的普遍化一直与否定欧洲现代性的普遍性诉求同在，而欧洲现代性实际上是伪装成普遍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从社会主义到人权、世俗主义、民主、科学和历史思想，都对欧洲现代性的所有方面提出了问题。在一个多世纪里作为变迁的发动力量的欧洲现代性，现在却因其在殖民主义和霸权中的共谋而受到责难。文化相对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主宰。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试图消灭帝国式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它甚至在其激进的一些分支——最为显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中留有痕

迹，直指其在资本主义中的基础。那些价值观在帝国主义统治中被虚假地使用，从而违背了它们自己的承诺，这向来是欧美实践中的一贯特点，欧美的实践是要确保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的空间，但仅仅注意到这些还是不够的。那些价值观通常被看做欧洲启蒙运动的表达，它们是欧洲社会呈现出现代性时的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伴随着全球扩张的新兴资本主义。那些价值观的文化偏见确实需要被仔细审视，因为它们指引了之后两个世纪权力斗争在资本主义内部、在国内的民族主义中和在国外的殖民主义中所走过的道路。那些渗透着文化偏见的价值观在欧美霸权之下已经是全球性的。

比起那些价值观被公然地虚假使用，这才是更重要的全球关注。这种关注伴随着不断增强的民族和文明的历史意识，而在欧洲现代性的制度下，那些历史意识曾被连根拔起。正是以那些价值观的名义，历史——不同于欧洲的历史及其移植到美洲的历史——在历史变迁和文化成就上都被责难为“落后的”：社会停滞在时间中被归因于它们的文化特征。批评欧美的普遍主义对恢复那些被埋葬了的替代选择是必要的，对持久地抵抗霸权来说也是必要的。两个目标都相当重要。

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应该记得我们都历史性地停留在欧洲现代性当中。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即将被复兴的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历史将被用于民族和文明认同的目的，这是后欧洲现代性的关注。引导这种复兴的历史思想无论从时间性上还是从评估性上来说都是欧洲现代性的。尽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领导都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性（Chineseness），但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性是从哪里来的，多数人认为中国性来源于现代性对中国进步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人们总体上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是模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年轻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共享着相同的消费文化——或许还带着对过去曾被剥夺的复仇心理。与欧洲现代性的关系以及欧洲现代性的价值观在中国也同样是被急切讨论的话题，这种情形与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其他社会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欧洲现代性不仅是一种威胁进入社会的外部力量，而且也

是组成世界上各个社会的内部力量。要给欧洲现代性指定一个地理空间也不容易，因为在经历了两个世纪之后它已经是全球各个社会的一部分。不仅要在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讨论欧洲现代性，也要在殖民主义的始作俑者当中讨论欧洲现代性。与南半球对欧洲现代性的批评相并行的是欧美社会的自省和反思，更不用说对宗教右派的启蒙价值观的攻击了。欧洲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为全球辩论设定了日程。即便是对欧洲现代性的否定也受到了世界上各种概念的影响，而那些概念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而且概念所使用的语言已经成为世界共同的遗产。在不同的地点或同一社会的不同人群中，欧洲现代性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但那最终只能说明欧洲现代性不仅存在于社会内部，而且能够跨越社会而深入日常的文化意识和实践中。

这些相互冲突的需求所带来的结果更适合被描述为混乱的现代性而不是可选择的现代性，这就是全球现代性的形势。就像前面所提到的，这种混乱（再加上贪婪被当做一种极端的价值观而到处传播）或许应对一种重大转变负有责任——以个人、族群和民族的经济成功来衡量现代性和文化价值。价值观共识的瓦解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撤退，此时，在日益脱离日常生活的全球性中，重大的政治决策权正从人民手中溜走。多元文化主义为民族和文明的神话——“东方”和“西方”——的复兴打开了大门，而这种复兴是极端反启蒙主义的。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由于缺少共同的价值标杆而阻碍了对各种文化诉求做出社会和政治的评价。同时，文化和政治的退化相当迅速，因为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都被看似势不可挡的消费文化征服了，这种受企业驱动的消费文化耗尽了消费者的所有文化。即使是消费文化的极端批评者在苹果手机和相关科技面前也不免妥协了，因为他们的激进观点正是通过那些技术传送出去的。

我认为现在需要做的是更多关注欧洲现代性的历史性及其与当下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认同于欧洲现代性的各种普遍主义是复杂历史的产物，而复杂的历史变迁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其针对它的所有斗争造就出来的。假如那些普遍主义在统治和称霸世界的历史中一直是共谋的，那么它们也是被激烈批评的对象，现在仍然如此——不仅在欧美而且是在全球范